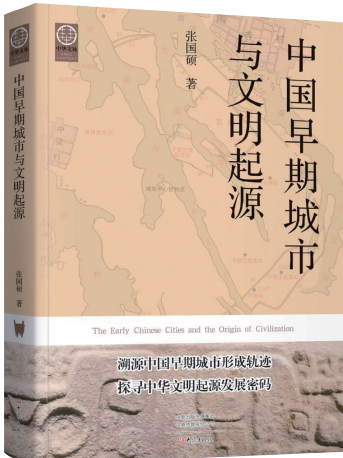


城垣何以奠基文明

——读《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

马达



随着近年来对考古知识的了解加深,笔者逐渐认识到在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中,城市不仅是聚落演化的高级形态,更是社会复杂化进程和早期文明形成的主要发生地,是了解早期先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然而,长期以来,关于中国早期城市的定义、判断标准、形成模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学界并未形成系统共识。普通读者对于“早期城市”的理解大都停留在考古报告的专业术语与田野遗迹的碎片化信息之中,难以触摸其完整的学术样貌。

郑州大学张国硕教授的新著《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的面世,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让我们得以端详其中。

作者早年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即扎根郑州大学,从事夏商周考古与先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本书的出版是其数十年考古研究与学术沉淀的结晶,是一位深耕田野的学者在积累了充分学术底气之后,面向公众的一次成果展示。

全书共计十二章,在架构上呈现出清晰的内在递进逻辑,从第一章探讨筑城多元目的入手,到第二章梳理城墙形成的渐进过程,再到第三章确定早期城市产生的年代,前三章完成了对“何为早期城市”这一核心命题完美而清晰的界定。

早期城市从孕育形成到发展繁荣,经历了三千余年的发展历史。从第四章“中国考古发现的早期城址”开始,作者按照仰韶时代、龙山时代、夏商时代三个大的时间段落,系统梳理了中国境内已发现的早期城址:良渚古城的水利系统、陶寺遗址的观象台、郑州商城的宫室布局——这些在专业著作中常见的重要城址,经由作者专业化地爬梳与厘清,在书中不再是孤立的考古遗迹,而是被有机地串联成条理明晰的文明演进链条,而连缀在这一闪光链条上的每一个节点,又在作者条分缕析地娓娓道来中,升华为社会分化、礼制形成和早期国家出现的重要文明标识。这一大板块堪称全

书的“顶梁柱”与“承重石”,在全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第五章到第八章的文字叙述语境中,作者从选址观、规划布局、军事防御、建造技术四个维度对早期城市的物质形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剖。他特别强调了我们的先民“择高建城、濒临河湖”的选址智慧,以及夯筑城墙、护城壕、城门等防御设施的演变规律,使读者得以透过考古遗存的表层,洞悉那个时代的社会组织能力与技术水平。

从第九章开始到第十一章,作者共用了三章的篇幅,渐进式地从早期城市的类型、发展演进过程和空间、区域差异等三个层面,对早期城市予以综合性的比较研究,经由抽丝剥茧似的叙述与论证,揭示出不同区域之间城市出现年代的差异、营建模式的不同、城市功能的区别以及城墙建筑技术的迥异。

以城墙建筑技术的迥异为例,作者将城市建设技术,尤其是城墙建筑技术,分为南、北、中三个区域加以讨论:南部区城墙的建筑技术相对落后,大多为堆筑,个别为夯筑、砌筑,版筑较为少见,城墙结构平地型占据绝对主体地位;中部区城市的城墙建筑技术先进,多见夯筑或版筑,少见堆筑,且夯筑、版筑技术出现较早,城墙结构多为稳定的基槽型,壕沟型占一定比例,少见依崖型;北方区城墙建筑技术略显先进,单纯,多为砌筑,商周时期出现少量夯筑,基本不见堆筑,砌筑技术较为发达,城墙结构多为平地型,少量为基槽型和依崖型,基本不见壕沟型。这种将时间与空间有机结合加以分析的写作框架,使全书在纵向上贯通了早期城市三千余年的演变历程,在横向上呼应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特征,可谓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展现出作者很高的专业素养与写作技巧。

如果说上述内容体现的是作者在早期城市本体研究上的实践层面成果,那么,“早期城市与文

故宫学研究的界定与成果

——《故宫学十讲》介评

周莎

故宫学研究兴起于21世纪,这一现象反映了人们对故宫价值与意义的认识与深化,其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是无数故宫人用研究诠释出的博大内涵。故宫学是中国文化体系中特有的研究内容,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具有与其他文化相连且不同的本质属性。

故宫学研究以研究明清紫禁城和故宫博物院为研究核心,但又不同于紫禁城的本体,与紫禁城相关的建筑、藏品,既是故宫的组成对象,又是其研究的范畴与内容。章宏伟先生所著的《故宫学十讲》一书,系统地梳理了故宫学的研究范畴,全面介绍了该研究领域的研究体系。

全书共十讲,前两讲聚焦理论探讨与概念界定。后八讲以论证为主,主要介绍了故宫学在历史学、文献学、文物学、博物馆学及版本研究方面的应用。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故宫学的研究范畴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故宫学的研究体系,与相关学科既互相联系,又不可分割,它们有机地构成了故宫学研究的学科结构。

何谓故宫学

本书第一讲着重阐述故宫学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问题,并对故宫学的概念进行了定义。故宫学从提出到发展,在宏观的历史层面,将紫禁城相关的研究,纳入故宫学的大背景和范畴。故宫学研究兴起的开端,是2003年由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先生提出建立“故宫学”。20年来,这一概念的研究内容逐渐丰富,研究方法不断发展,形成了较为明确的研究范畴。

“故宫学”不同于“紫禁城学”。作者辩证地阐释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故宫学特有的内涵与外延,体现了这一研究领域的鲜明特质,也是故宫学与其他学科的重要区别之一。

分支学科不同的综合性研究

故宫学作为新兴的学科,它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广泛,且拥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研究角度。面对多学科领域交叉研究方法的运用,其研究对象涵盖明清紫禁城和故宫博物院。

郑欣淼先生曾指出“故宫学”研究的六个主要方面,强调的是故宫学内容范围的外延。而本书作者认为,故宫学学科体系与相关六个门类对应学科的关系,是两者相交重叠的部分,这部分便是故宫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故宫学的结构应当被视作本体学科,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应包括故宫学基础理论、故宫学分支学科及相关学科,三者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它们有机地组成了故宫学研究的学科体系。作者提出了故宫学的学科体系,分别是:故宫学原理、故宫建筑学、故宫文献学、故宫文物学、故宫历史学和故宫博物馆学,为故宫学的研究界定了研究范围。

以档案证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本书第二讲梳理了故宫学学术的发展进程。从

建院伊始的故宫学研究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故宫学研究:从罗振玉抢救清宫档案,到国民政府古物陈列所,从社会各界对故宫的研究,再到清室善后委员清宫物品的点查,故宫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且自成体系的学科,从始萌到初兴,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由此可见,创立故宫学理论体系,是历史的必然。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文献档案,运用故宫文献学和故宫建筑学综合研究方法,为元大都宫城位置考证提供了重要依据。通过故宫学的研究方法,对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关于元大都位置的错误提供了有力证据。正如1925年王国维先生所提倡的“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显而易见,故宫文献学为研究故宫历史学和故宫建筑学,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种方法,亦类似于“二重证据法”的多重材料互证。通过互证,得以证明《南村辍耕录》中的观点和表述错误。

值得一提的是,在清代康熙朝测绘活动中,通过《皇舆全览图》实物所见,这一时期的测绘,运用了西方较为先进的“经纬度测量”方法。这种地图测绘技术的引入与实践,是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同时也是一次重要的科学实践。

本书的第五讲至第十讲,从清初入关满文教育的发展与满文出版着力,开端于顺治朝满文图书出版的兴起,到创建翻书房、出版武英殿图书,使清代官廷的出版业不断发展,推动了满族文化与汉文化的深度融合。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的出版事业同样成果丰硕。

对于故宫的藏品,本书以郑珉中先生的古琴鉴定研究为题,从藏品鉴定,到运用相关档案的档案文物学研究,对故宫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进行了举例论证。档案文物学的研究方法,也是故宫学独有的研究方式。通过档案不仅可以找到故宫相关藏品制造时的档案内容,还可以了解该藏品制造所记载的工艺和流程。即每一件所陈设的清宫制造的文物,对应于“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又称“内廷恭造”式。

继往开来的发展历程与多学科融合

百年故宫博物院历经历代维修,保存至今。紫禁城的百年大修,是自明永乐年间建成以来的又一次宏大的维修工程。

郑欣淼先生在任之际,不仅开展了故宫百年大修工程,还开展了七年文物清理工作。通过文物清理工作,提高文物管理和信息化水平,同时对藏品进行定级保护。与此同时,故宫博物院注重两岸学者之间的交流,同时亦着手于故宫学的开拓。2010年9月26日,故宫学研究揭牌。故宫学研究所为进一步做好研究平台的搭建,开展了组建故宫学研究队伍、在高校成立故宫学研究机构、组织编纂和出版故宫学著作等工作。通过上述工作,故

明要素的形成”(第十二章)则是在理论层面的能力展示,也是他将中国早期城市的研究成果与中华文明起源有机结合的结晶,凸显了他把长期浸润考古前沿的实践上升为理论的扎实素养。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以“城市、文字、青铜器”作为判定文明的三大要素,这一标准虽有其特定的学术语境,却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历史实际。作者认为,中国早期城市本身就是孕育阶级分化、文字礼制与青铜技术的核心载体。城市是等级社会和礼制孕育形成的重要场所,见证了青铜器、文字等文明因素的形成和发展。书中对早期城市与文字起源关联的探讨,与郑州小双桥遗址朱书文字、二里冈商代刻辞等考古发现形成呼应,为文明要素演进研究提供了关键参照。

在笔者看来,这一论说的意义在于它突破了西方文明三要素论的认知局限,为文明起源的“中国方案”增添了具有本土解释力的实证支撑,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地化”的典型案列。书末所附的“中国早期城市统计表”,以翔实的数据为全书论述提供了实证基础,使“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特征有了可供反复检查的学术支撑。

这种将“城市”作为文明研究核心变量的理论视角,对于深化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文明要素的考察,不应满足于对个别器物的孤立辨识,还应将其置于社会复杂化进程的整体框架中加以理解。城市,正是承载这一整体框架的核心物质载体。

作为一部图文并茂的“学术通俗读物”,本书在学术性与可读性之间的平衡,也是其值得称道之处。书中既保留了早期城市研究的核心学术内容,又通过“城市地图”式的篇章结构,引导读者在清晰的知识框架中逐步深化理解。书中的近百幅图片——城址平面图、发掘现场照片、遗址复原想象图,与正文形成了有效的图文互证关系,使复杂的空间布局和建筑结构变得直观可感,图文并茂的版式设计也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愉悦感和轻松感。

这部新著,激发了今人探究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的兴趣。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所评价的那样:“这部著作的出版恰逢其时,既满足了公众对文明探索的关注需求,又通过通俗化表达让考古成果走进大众,是公共考古普及的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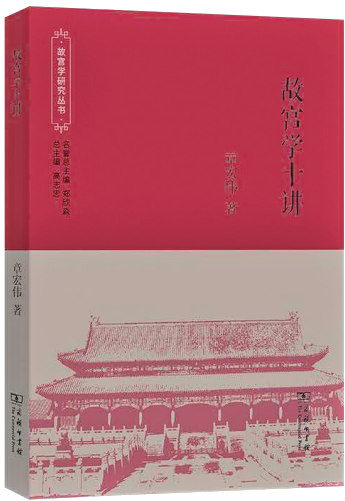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文心出版社)

《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

作者:张国硕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2月



宫学研究深入发展,为多学科的研究方向与故宫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王旭东院长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的《故宫学二十年——内涵、使命与展望》,系统地阐释了故宫学的学术内涵和研究对象,并提出故宫学的使命。包括对中国文化的整体研究,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研究、建设开放的故宫学学术体系,提高故宫学的话语权、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期望研究者立足故宫,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对故宫学深入探究,扩大故宫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诚如所言,故宫学科建设任重而道远。不遗余力地提升故宫学研究水平,推进故宫学研究深度,扩大故宫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这种历史责任和学术使命,是故宫学学者应有的责任担当。

结语

整体而言,《故宫学十讲》一书以故宫学研究为学术背景,聚焦于故宫学研究的主要核心问题,其具体涉及各个方面的研究,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从元大都宫城的历史、清代舆图测绘、清代满语教育、故宫典藏的藏品、故宫先贤的研究、民国时期的故宫出版业、新时期的故宫出版与文创等发展研究的历程,通过文献资料及文物实物、由点及面、以小见大的研究视角,解决了诸多故宫学研究的重要学术论题,是故宫学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作者通过撰著《故宫学十讲》一书,呈现了故宫学研究的基本概况和现状,为学界研究故宫学起到了“范式”作用,并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推动了故宫学的深入研究,开拓了故宫学的研究视角,为故宫学者治学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

正如作者所述,该书围绕故宫学学科体系建设、故宫学研究对象、故宫学研究历程及前瞻等主题撰写了十篇论文,仅为浅尝辄止之作,但其抛砖引玉的研究视角与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希望广大读者能够从书中领悟到故宫学研究的方法、汲取营养,从中收获启发,并以此推动故宫学研究进入崭新的阶段。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故宫学十讲》

作者:章宏伟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6年2月

博物馆图书指围绕博物馆而创作、博物馆直接或间接参与出版的书籍,大致可分为专业和通俗两大类,包括学术著作、藏品图录、展览图录、科普读物、绘本、传记、小说等多种类型。博物馆图书往往图文并茂,兼具知识性与观赏性,既为博物馆工作留下永久记录,更以独特形式承载人类文化遗产。

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国博”)与商务印书馆联合推出的《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简称《饮食》)展览图录英译本,集中呈现了300余件(组)国内文博机构藏品,向全球读者讲述中国古代饮食文化数千年的变迁、诠释中国博物馆学者的研究成果与策展理念。该书代表了我国博物馆在图书对外出版领域的一次主动尝试,其出版过程折射出当下国内原创博物馆图书走出去的特点与难点。

出版途径选择

我国博物馆图书对外出版目前主要有以下途径:借助文博项目国际合作机遇,由国外合作方联系本国出版社推出外文版书籍;经国内出版社对外输出中文版权、在国外出版外文译本;国内博物馆直接与国外出版社合作。

《饮食》英译本采用的是与国内出版社合作。这一途径无需依赖海外出版资源,沟通便捷,且中方在选题、创作、设计上拥有较大自主性。该书出版策划伊始,合作双方分别指定业务骨干组成联合出版团队,并确立了磋商协作机制。

博物馆选题优势

找准选题方向是出版的首要前提。博物馆图书得天独厚,馆藏文物及相关历史、人物乃至博物馆本身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场馆空间中的观众又为观众一读者的身份转化带来无限可能。《饮食》英译本出版团队调研了国博外籍观众的参观反馈并请策展人填写问卷,预判目标受众对中华文化的认知情况,对比不同类型馆藏和展览的特点。

饮食选题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一方面国博饮食类文物自成体系,足以支撑起较完整的中华饮食文化脉络;另一方面“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本身很受外籍观众欢迎。该主题既突出国博特色,又能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同时具有跨文化亲和力。尽管英文出版市场上同类题材作品并不少见,出版团队认为,从中国博物馆出发、以中国文物书写的饮食故事仍有无法替代的魅力。

跨文化的多重书写

今天,博物馆学思想推动博物馆向观众转向,博物馆图书也由此肩负起更多向公众普及知识的职责,降低专业门槛、提高可读性逐渐成为出版共识。翻译则意味着博物馆图书需要进一步突破语言文化壁垒,被异域文化读者所理解和接纳。就《饮食》英译本而言,做好中国文博术语的精准转译,同时向英文读者讲清楚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深刻内涵,取得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平衡,是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

面对翻译挑战,出版团队一边横向借鉴中国文学和学术外译领域成熟经验,一边贴合博物馆图书特性,创新内容重构方式。翻译开始前,为了清理跨文化理解障碍,出版团队对图录中文内容进行了改写,以补足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为主、适度稀释专业术语浓度为辅,策展团队提供学术支持。出版团队还对文物一一编号,并在正文引用时标注,以加强图文信息的前后连贯;同类文物特意添加了小组标题和说明,让全书结构更清晰、重点更突出。译者组合上,出版团队采用中外合译模式,邀请长期从事中国历史主题学术著作英译的国内高校学者担任主译,由中文流利的英国专业编辑兼译者负责润色译稿。两位译者及时与出版团队和策展团队沟通翻译问题,译文最后提交出版团队进行多轮审读。

实践证明,上述多方协同的工作模式有力保证了英译本的学术严谨性,也成功实现了叙事视角的丰富性与表达的国际化。以汉代文物“大豆万石”陶仓为例,译文不仅通过英文定名有意提醒读者,陶仓为模型而非实用器,还额外解释了汉字铭文的字面含义及情感寓意(对丰收的祈盼),并且补充了“石”这一中国古代常见谷物计量单位与现行国际通用容积单位“升”的换算。

为国际传播而变身

形式是图书对外出版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尽管简单复刻《饮食》中文版版

国际传播时代,博物馆图书如何走出去

——《中国古代饮食文化》英译本出版手记

夏美芳

式、精装布面装帧、235毫米×305毫米的成品尺寸不失为一种经济快捷的方式,出版团队还是以国际传播效果为考量,将符合国际出版惯例、提高中华文化辨识度及方便携带视为英译本的基本要求。

在大量参考英语国家主流出版社编辑体例和全球知名博物馆出版物常用装帧设计的基础上,全书英文字体、版式均对齐英文出版国际标准;重新设计后的封面书中收录的中国传统饮食器做了艺术化提炼。为更好地满足跨国旅行中携带书本的实际需求,封面使用软精装纸面,内文改用克重更轻、适合四色印刷的特种纸,成品尺寸变为185毫米×250毫米,在体积和重量上“瘦身”。经过一番重塑,原书沉稳厚重的设计风格被明亮轻快所取代,既保留了国博展览图录应有的典雅大气,又增添了中国书籍原创设计文化自信与国际化审美。

馆社传播优势互补

不同于一般出版物,博物馆图书的国际传播渠道更为多元:出版社依托其专业发行营销网络、媒体宣传矩阵、国际书展等对外展示与版权合作平台,赋能图书的IP国际影响力多维扩散;博物馆凭借自身文化品牌塑造、国际合作关系网络以及展览、社教活动、商店、网站、社交媒体等一系列富有

博物馆特色的媒介,可以扩大图书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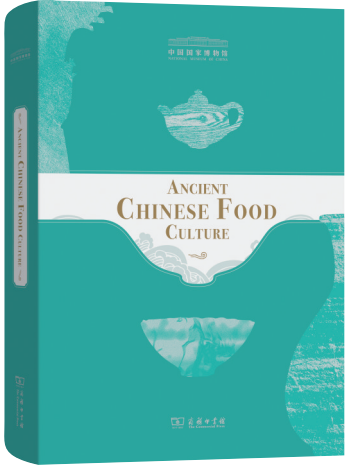
《饮食》英译本出版后,合作双方结合自身优势,通过不同渠道努力提高图书在博物馆物理空间、全球文博圈和出版市场的可见度。2025年,该书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亮相,吸引了海外中国研究者的目光。除此之外,出版团队还在持续收集实际读者反馈。一些从事跨文化交流的专业人士对该书抱有浓厚兴趣,反映出国内读者对本土博物馆图书内容和翻译水准的高度期待。读者反馈为及时调整未来同类图书的翻译出版策略、加大国内外同步传播力度提供了有益借鉴。

出版启示与展望

《饮食》英译本从策划、选题到内容打磨、传播落地等关键环节都有博物馆的主动参与,而博物馆图书出版本质上具有跨界合作属性,需要博物馆与出版社打破行业隔阂、多层次开展协同。首先要做好对外出版顶层设计,立足本馆特色,深挖优质选题,对接受众需求,跟进读者反馈,将有限的翻译出版资源精准聚焦提升国际传播价值;其次,重视翻译这一国际传播基础工作,吸纳国内外相关领域学者和专业译者,严格规范术语体例,以高品质对外出版树立我国文博外译标杆;再次,拥抱开放灵活的跨文化写作手法,强化“文一物一图”多模态链接,适当引入中外合编、合写、合译模式,让中国文物叙事适配全球语境,在出版中促进中外文化和思想的交流对话;最后,培养博物馆、出版、传播复合型人才,借力对外出版平台,打通不同出版途径,拓宽海内外主流传播渠道,积极探索图书传播的分众化、多语化、区域化和在地化。

“十四五”规划纲要对“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作出具体部署,提出“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拓展海外传播网络,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随着我国博物馆出版意识的不断增强,未来有望与出版界通力合作,打造出一批圈内外、国内外叫好又叫座的优秀作品,以博物馆为桥梁,以书为媒,向世界阐释好中国文物价值、展示中华文化精髓、展现当代中国博物馆风采,发挥博物馆图书的巨大潜力。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古代饮食文化》英译本

编著:中国国家博物馆

译者:彭洋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5年6月